

# 性别语境下的家国书写\*

——明清之际女遗民创作的精神特质论析

乔玉钰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特殊的历史情境，造就了一批具有遗民意识的女性作家，她们身历鼎革，以文学创作展现时代变迁与个人情怀。女性遗民之概念界定标准与男性有所不同，类型也更为丰富。其家国书写中独特的精神内质，可以从私情呈现、心理困境以及对性别身份的怅恨三个层面得到认证。对比男性作者，女遗民创作具有自身的性别特征，可借此观照并补充历史话语传统。

**关键词** 明清之际 女遗民 家国书写 性别语境

明清更替，在“以夷变夏”“剃发易服”的特殊情境下，涌现出一批不仕新朝的遗民，成为一种超越单纯政治范畴的文化现象，引起研究者考索的兴趣。有学者总结，“遗民”应具备两个要素：首先，“必须是生活于新旧王朝交替之际，身历两朝乃至两朝以上的士人”，“在新朝必不应科举，更不能出仕”；其次，“其内心深处必须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sup>①</sup>。然而，家国之思并非专属于“士人”。春秋时期，漆室女已提出：“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sup>②</sup> 朝代更替，女子看似与政治无直接关涉，内心却同样可能怀有遗民意识。南宋覆亡，诸宫人被虏北行，将对故国的追怀托诸词章，如“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sup>③</sup>“风飏飏。雨飏飏。万里归人空白头。南冠泣楚囚”<sup>④</sup>。明清鼎革，故国情结与遗民意识在知识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明显。王思任之女端淑以“吟红”名集，“不忘一十七载黍离之墨迹”<sup>⑤</sup>。葛徵奇妾李因在葛氏罹难后遁入空门，“抱故国黍离之感，凄楚蕴结”，“亡国之音与鼓吹之曲共留天壤”<sup>⑥</sup>。乔可聘妻潘氏于明亡后“流涕累日，作绝命诗四章，置衣带间，阖户自缢。为家人所觉，故得免”；后其子乔莱补诸生，潘氏“忽忽不乐，复作诗一章，略叙其所以教莱者，以深有负于前四诗为愧”<sup>⑦</sup>。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顾炎武养母王贞女为殉明绝粒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女性文学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CZW028）、教育部第四十九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明清女性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张兵《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刘向著，张涛译注《列女传译注》卷三“鲁漆室女”条，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③ 王清惠《满江红》（太液芙蓉），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5页。

④ 章丽贞《长相思》（吴山秋），汪元量《宋旧宫人诗词》，《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7册，第546页。

⑤ 丁圣肇《吟红集序》，转引自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⑥ 黄宗羲《李因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⑦ 汪琬《钝翁续稿》卷二七《敕赠乔母潘孺人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228册，第289页。

亡，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sup>①</sup>此堪为女性故国之思的显证。而在明清文人笔下，已出现对女性“遗民”身份的认可。“以诗古文名当世”的才女吴山作中多“玉树铜驼之感”，“魏叔子《青山集序》，邓舍人赠诗，咸以女遗民目之”<sup>②</sup>。由邓氏“青山自署女遗民”之语可知，吴山曾以“女遗民”自命，且在当时得到男遗民的首肯<sup>③</sup>。乾嘉时期的女诗人王迺德在《竹净轩诗话》中称吴山“闺阁遗民君独擅”<sup>④</sup>，可谓女性自身对同性“遗民”身份的认同。到了民国元年（1912）刊刻的《明遗民录》，末卷已专录女性遗民，虽未为全备，数量亦远不足与男遗民比肩，却体现了对遗民中“女性”这一群体的关注<sup>⑤</sup>。

前文提及，士大夫之为“遗民”，必须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且不仕新朝，不应科举。但女性难以根据出仕与否界定遗民身份<sup>⑥</sup>，只能采用不同标准。谢正光先生将明遗民界定为“无论僧道、闺阁，或以事功、或以学术、或以文艺、或以家世，其有一事足记、而能直接或间接表现其政治原则与立场者”<sup>⑦</sup>，因而女性有较强遗民意识者，皆可承认其为遗民。明清之际女遗民的“遗民意识”，或体现在自身曾有殉明、复明等行为，或体现在对明以外的政权表现出排斥的态度，或体现在通过作品或其他方式表露眷恋故国的情绪。关于明清之际的男性遗民，已有较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探讨。然而，“我们讨论士大夫政治，不能不注意其群体的发育环境，不能不注意日常生活中支撑着这一群体的背后力量”，“也就可能关注到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中女性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力”<sup>⑧</sup>。又如余英时先生所言：“自来言遗民者，往往不及妇女。今平心论之，使无贤母德妻，主持于内，男子又乌得独成其节于外乎？”<sup>⑨</sup>女性的声音常常会湮没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或者她们不可避免地使用曲笔来迎合、屈从于女德规范；但是，我们仍能从她们的文字中窥见某种因与正统的公众化书写偏离而造成的缝隙——被遮掩的真情实感、道德观的彷徨、对女性存在意义的追问……凡此种种，不仅反映女性自身的精神特质，而且是社会思潮、时代精神在女性身上的投影，亦可借此观照男性社会。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诗史观本是女性诗学传统，似乎并不为过”，尤其是“从清初到清末的动乱时期，具有诗史特征的作品成就突出，成为闺秀诗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观念之一”<sup>⑩</sup>。鼎革之际女性的生存与书写虽已有

① 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5页。

② 王豫《江苏诗征》卷一六三“吴山”条，清道光元年（1821）焦山海西庵诗征阁刻本，第4b页。

③ 据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卷五“吴山”条（清宣统元年刻本，第4a页），邓汉仪赠诗曰：“江湖萍梗乱离身，破砚单衫相对贫。今日一灯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遗民。”吴山《青山集》刊刻于顺治初年，此时邓氏尚隐居不仕，其遗民身份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儒科试时才消失。

④ 《江苏诗征》卷一六三“吴山”条，第4b页。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卷五“吴山”条作《竹净轩诗话》，误。

⑤ 孙静庵编《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版），共录明遗民523人，其中女遗民10人（铁娘子、毕骏文、刘淑英、香娘、隐隐、草衣道人、文莺、沈云英、商夫人、仲商夫人）。明清之际，有殉明、抗清行为或表达故国之思的女性散见于各类文献记载，远不止孙氏所列（本文提及的多位女遗民便未列出）。再鉴于古代女性生平彰显与作品流传不易，实际存在的女遗民应不止于现存文献可见的数量。

⑥ 顺治年间，清廷欲延请王端淑入禁中教授诸妃，端淑力辞不赴，此可谓女性涉及类似“出仕”的少数特例。此外，女性或因男性亲属显贵而自清廷获得封号或旌表，但与男性选择出仕性质不同。

⑦ 谢正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叙例》第1页。

⑧ 邓小南《存在？不存在？——女性与中国古代政治史》，刘咏聪主编《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新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⑨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17页。

⑩ 宋清秀《清代闺秀诗学观念论析》，《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学者论及<sup>①</sup>，但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明清之际女遗民作品，探寻其中蕴含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并通过与男遗民之作的对比，揭示女作家遗民意识中隐含的性别特征，同时借此对明清之际历史书写的男性话语传统作出补充。

依据家室状况，本文将明清之际的女遗民作家粗略分为三类<sup>②</sup>：一、殉明烈臣或明遗民之妻女，前者如王思任女端淑、祁彪佳妻商景兰、孙临妻方子耀、葛徵奇妾李因，后者如方以智妻潘翟、方中通妻陈舜英、方中履妻张莹、张成义女鸿逖；二、仕清贰臣之妻女，如陈之遴妻徐灿、熊文举妻杜漪兰、李元鼎妻朱中楣；三、父夫在明亡前已亡故，父夫明清两朝皆未出仕或仕清但非贰臣，或父夫政治态度不详但其自身有较强遗民意识者，如刘淑、顾贞立。这三类女作家笔下都表现出哀悼国破家亡、追缅故国旧朝的遗民群体意识，但由于家室状况的不同，这三类女作家的遗民心志又表现出细微差别，下文将予以详述。

### 一 忠烈之家女性书写的私情呈现

江山易主，士大夫往往面临生死抉择，也面临情与义、忠与孝难以两全的无奈。凌义渠自缢前寄语其父：“尽忠即所以尽孝，男视死如归，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亲衰年无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sup>③</sup> 祁彪佳殉国前，与其妻商景兰诀曰：“我不幸值此变故，致于分手，实为痛心。但为臣尽忠，不得不尔。”<sup>④</sup> 正因凌义渠与祁彪佳最终舍弃“儿女私情”，成全“君臣大义”，对衰父病妻弱子的“不堪回想”，对夫妇死别的“实为痛心”，不但无玷节操，反而更显人格伟岸。倘若士大夫真的将“家”置于“国”之上，不免如吴梅村“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贺新郎·病中有感》）的自忏。龚鼎孳“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的轶事，更显出几分滑稽<sup>⑤</sup>。唐自彩被俘后，敌帅以少妾幼子相要挟，自彩答以“大丈夫岂以子女易大节”，终于殉国而死<sup>⑥</sup>。王猷定于携家流离途中自言：“国难轻妻子，时危重甲兵。”<sup>⑦</sup> 祁彪佳的别妻书虽情深意长，在绝命诗中却慷慨陈词：“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sup>⑧</sup> 这种洋溢着浩然正气的“公众书写”反映出士大夫危难时刻标榜节操、垂范后世的渴望，亦可窥见主流价值

① 相关论著主要有：孙康宜《末代才女的乱离诗》（《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358页）、孙慧敏《天下兴亡，“匹夫”之责——明清鼎革中的夏家妇女》（《台大历史学报》2002年第29期）、赵雪沛《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明宗室女词人朱中楣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拙文《遗民の家における女性詩人——明末清初の桐城方氏を中心に》（《叙说》2012年第39号）、郭苑平《明末清初商景兰遗民心志与艺文生命初探》（《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12年第8期）、俞士玲《陈之遴、徐灿南明前后的经历和词作》（张宏生编《继承与创新——清词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65页）等。

② 分类中或有交叉之处，如陈舜英既为遗民方中通之妻，又为贰臣陈名夏之女，此种情况依据其自身言行酌情归类。因本文重在女遗民作家，故对女遗民中无作品传世或传世作品极少者鲜有涉及。

③ 茅曦蔚《大廷尉茗柯凌公殉节纪略》，冯梦龙《甲申纪事》卷一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史部第33册，第612页。

④ 祁彪佳《别妻室书》，《祁忠惠集补编·祁忠惠公遗集》，清道光刻本，第5b页。

⑤ 《甲申纪事》卷二“龚鼎孳”条，《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3册，第391页。清初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士林清议的一种形式”（蒋寅《遗民与贰臣：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无论该轶闻是实有其事还是他人附会，都可以反映当时的舆论趋向。

⑥ 徐鼐《小腆纪传》卷四九“唐自彩”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15页。

⑦ 王猷定《己亥七月，移家卢家堡舟中即事》，卓尔堪《明遗民诗》卷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上册，第27页。

⑧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九《遗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2页。

观对士人阶层的道德约束力。

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政治抉择不仅关涉自身生死荣辱，还波及一门安危祸福，身为其妻，必难置身事外。孙临抗清被俘，不屈而死，其妻子方子耀投水获救，辗转归乡，养老训子以终。方中履在其传记中嘉许：“公固伟男子，然使恭人如世俗妇女，怨谿挠乱，公志亦何由遂？……恭人虽巾幅乎，等烈丈夫矣。千秋而后，与公并垂汗简。”<sup>①</sup> 遗民陈确在《祭妇文》中感念其妻：“吾有父母，子为吾养。……吾有子女，子为吾衣食。”<sup>②</sup> 这些都体现了男性认可践行节义背后的“内助之功”。

方中履、陈确等人将对贤妇的赞誉形诸笔端，却只能代表男性视角，当女作家亲执彤管，便显示出与男性书写的偏离，如商景兰在《悼亡》中写道：

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sup>③</sup>

如顾炎武养母王贞女般殉国固然为世称道，但女遗民养老抚孤亦无玷节操，没有士大夫那种以“生”为“偷生”，“几欲捐躯励微节，亦以亲故遂苟存”<sup>④</sup> 的焦虑和自我剖白。因此商景兰敢于声称“吾犹恋一生”，并将“儿女人情”提升到与“君臣大节”同等高度。同样，“毁尽钗环纾国难”<sup>⑤</sup> 的女诗人刘淑在《送某公从军》一诗中写道：“公有北堂余有萱，公有幼儿我有稚。公既为国不有家，余拟为亲酬世契。在家在国总宜忠，忠义决不将亲弃。”<sup>⑥</sup> 对男子勉以从军尽忠之责，女子以抚儿养老为辅佐，“在国”“在家”皆可行忠义之事。

然而，贤妇“在家”践行忠义之责，真实感受到底如何？方中履虽盛赞姑母方子耀不同于“世俗妇女”，使其夫终遂其志，但子耀之作大多亡逸，其心境已无从知晓。而方以智之妻、方子耀之嫂潘翟的六首《哭夫子》，却真实呈现了贤妇成全夫婿节操背后的斑斑血泪：

岁岁望君归故里，哪知跨鹤向云天。伤心抢地惟求死，何日追随到佛前。

回忆分离出世外，吾携稚子返家园。全君名节甘贫苦，无限伤心不敢言。

一别天南逾廿年，思君容貌亦端然。余心实望能挥日，此去光阴再弗还。

展转思思肠寸断，寒帏寂寂泪如泉。望君点醒南柯梦，只恐凡魂命可怜。

伤心一别竟成真，万里还家只苦辛。追忆当年心已碎，还期速度未亡人。

一生大节已完全，两地伤心只问天。无限风波悲不禁，可能相见在重泉。<sup>⑦</sup>

方以智半生“为劳人、穷子，为刀环上人，为羈囚，为孤旅，为逋客，为僧，为老病，以至于死”<sup>⑧</sup>，可谓士人志节之表率。遗民潘江盛赞潘翟“上事贞述公，下抚子女，死丧婚嫁之累，一身任之，以纾文忠公内顾之忧，成其大节”<sup>⑨</sup>。而在潘翟的自述中，我们更多地读出的是弱女子独支门户的艰辛和骤失所天的苦痛。“全君名节甘贫苦，无限伤心不敢言”“一生大节已完全，两地伤心只问天”之语，纵非悲恸，字里行间仍能窥见“成其大节”背后隐忍的哀怨。

无论出乎本心还是迫于道义，士大夫为国不惜毁家殒身，且表现得无悔无怨。但妇人本职在“持

① 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卷上《姑母孙恭人传》，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本，第44a页。

② 陈确《陈确集》卷一三《祭妇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上册，第313页。

③ 商景兰《商夫人锦囊集·悼亡》（其一），《祁彪佳集·附编》，第260页。

④ 方文《涂山集》卷三《赠别周颖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132页。

⑤ 刘淑《个山遗集》卷二《军事未毕，家人劝我以归十二首》（其一），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本，第3b页。

⑥ 《个山遗集》卷五《送某公从军》，第5b页。

⑦ 潘翟《哭夫子》，潘江《龙眠风雅续集》卷一九，《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第649页。

⑧ 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八《首山濯楼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2册，第147页。

⑨ 《龙眠风雅续集》卷一九《潘翟小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第649页。



以抚其子，乡人义之。<sup>①</sup>

黄氏敢于“自遂”，最终“乡人义之”，可见女子在当时为奉守大义颠覆“从夫”之道值得称颂。明清之际，心系故国、甚至以身殉国者不乏女性，前文已列举顾炎武养母王贞女、乔可聘妻潘氏等例证。然而，“忠君爱国”主要施行于男子，女子在诸多方面依附夫婿，且“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婿改节，无论遵行妇道从夫，还是信奉君臣忠义不从夫，都符合主流道德标准。正因如此，明清之际，通诗书、明大义且“备有妇德”的贰臣之妻，往往容易陷入心理困境，徐灿、杜漪兰、朱中楣这三位女遗民都可谓“解得其中味”。

徐灿被推尊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sup>②</sup>，甚至“清新独秀，为闺秀弁冕”<sup>③</sup>，较受研究者关注，其笔下的故国之思与对夫婿陈之遴仕清的态度也已被涉及，在此仅略举一二。如名作《踏莎行·初春》中的“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sup>④</sup>，钱仲联先生赞其“于念旧伤离之中，寄沧桑变革之叹，故谭献《篋中词》评云：‘兴亡之感，相国愧之’”<sup>⑤</sup>；陈邦炎先生认为“故国茫茫，扁舟何许”与《满江红·将至京寄素庵》中的“满目河山牵旧恨，茫茫何处藏舟壑”相似，都表达了“国亡家破、容身无地之感”，并推测“月痕休到深深处”隐含对其夫重去北京的劝阻<sup>⑥</sup>。张宏生先生则分析徐灿“必须在国家与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两者都有儒家大传统所赋予的规定性”，“处于一种强烈的内心分裂之中”<sup>⑦</sup>。这种“国家”与“家庭”间、“大义”与“妇德”间的“内心分裂”并非徐灿独有，熊文举和李元鼎都是改节之臣，与陈之遴并入《清史列传·贰臣传》，其妻杜漪兰和朱中楣笔下，也表现出类似的矛盾与纠结。

杜漪兰字中素，熊文举室，有《耻庐集》<sup>⑧</sup>。“耻庐”令人联想到明遗民金廷韶之事，因有感于某义士殉国，廷韶自题其庐曰“不忠不孝颯颜天地一大罪人，良可耻也”，并以“耻庐”为号<sup>⑨</sup>。至于杜漪兰之“耻”缘何而来，从《贰臣传》关于熊文举的记载中可窥见端倪：

熊文举，江西新建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官吏部郎中。福王时以文举曾降附流贼，李自成定，入从贼案。本朝顺治元年投诚，仍原官。<sup>⑩</sup>

由此可知，文举曾降顺，后又仕清，有此经历的士大夫往往更易为时论所鄙。杜漪兰现存作品较少，无法深入探究其心境，但以“耻庐”名集，应非无的放矢。杜漪兰与朱中楣“共丁国忧，周旋患难，不啻手足”<sup>⑪</sup>，且鼎革之际夫婿仕宦经历接近<sup>⑫</sup>。顺治三年（1646），漪兰随夫归乡，中楣作《南乡子》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册，第7756页。

② 陈维崧《妇人集》，《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401册，第7页。

③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四，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2467页。

④ 徐灿《拙政园诗余》卷上《踏莎行·初春》，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二集），清光绪刻本，第11a页。

⑤ 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7页。

⑥ 程郁缀《徐灿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11—12页。

⑦ 张宏生《偏离与靠拢——徐灿与词学传统》，《暨南学报》2005年第2期。

⑧ 《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杜漪兰”条作《知耻庐集》（第326页），标明“《众香词》著录”，然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东书局影印康熙本《众香词·礼集》作《耻庐集》（第8b页），《小檀栾室闺秀词钞》卷六“杜漪兰”条亦作《耻庐集》（第19a页）。

⑨ 王源《金主事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五，民国十二年（1923）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刻本，第10b页。

⑩ 《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周骏富主编《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05册，第762页。

⑪ 朱中楣《南乡子》小序，《众香词·礼集》，第4b页。

⑫ 《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李元鼎，江西吉水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流贼李自成陷京师，元鼎从贼，授伪光禄寺少卿。本朝顺治元年，睿亲王定京师，元鼎投诚，授太仆寺少卿。”（《清代传记丛刊》，第105册，第765页）

相送，漪兰回赠以“庆易水之生还，羨鉴湖之得请。乃有名媛，实族王储。……留连北渚，调寄南乡”<sup>①</sup>之语，庆幸自己“生还”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挚友羁留京师的同情。朱中楣传世作品较多，贰臣之妻的心理困境得到了较详尽的印证。

朱中楣原名懿则，字远山，为明宗室朱议汶之女。其夫李元鼎称她“幼娴礼训，长好诗书。每闲居相对，私与扬扝，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与夫古今治乱兴亡之故，仕宦升沉显晦之数，未尝不若烛照而数计”<sup>②</sup>，足见她关心国政，且识见不凡。作为宗室之女，朱中楣对家国倾覆有更深伤痛，笔端时带黍离之悲：“玉衡今欲低，山河已非故。”<sup>③</sup>“山川如旧冠裳改，城北城南起暮笳。”<sup>④</sup>“兴亡瞬息成千古，谁吊荒陵过白门。”<sup>⑤</sup>“荒城处处伤离黍，旧燕飞飞觅画梁。家国可堪寥落甚，怡情何地足沧浪。”<sup>⑥</sup>“睽越此情同。归念匆匆。湿云迢递锁明宫。为问沧桑无限事，今已三逢。”<sup>⑦</sup>特别是读到徐灿的《满江红》后，不禁感而和之。徐灿现存《满江红》六阙，除题为《将至京寄素庵》一阙用人声第十六部韵（依戈载《词林正韵》，下同）外，其余五阙皆为朱氏和作所用入声第十八部韵，且这五阙《满江红》都抒写了身为女遗民的悲慨，如“痛烟芜何处，旧家华阅”<sup>⑧</sup>，“往事堪悲闻玉树，采莲歌杳啼鹃血。叹当年、富贵已东流，金瓯缺”<sup>⑨</sup>。朱中楣于词题注明“读陈素庵夫人词感和”，我们虽无法断言她“感和”的是徐灿五阙《满江红》中的哪一阙（又或许兼而有之），但可以推知，她对徐词中的遗民情怀心有戚戚，并表达了“举目关河空拭泪，伤心杯酒空邀月。叹人生、如梦许多般，皆虚掷”<sup>⑩</sup>的伤悼情绪。

既为明宗室之女，朱中楣对夫婿改节应更多一重痛楚。夫妇二人关于仕隐的龃龉，也可在几组唱和之作中找到线索：

戟门箫鼓日三挝，铃阁深深小院斜。独有春光偏解事，却能委屈到官衙。（李元鼎《戟门》）<sup>⑪</sup>

江南社鼓日频挝，紫燕纷飞带落霞。何事春归归未得，天涯犹自滞官衙。（朱中楣《和戟门》）<sup>⑫</sup>

忆家山。盼家山。世乱纷纷求退难。罗衣泪染斑。昔为官。又为官。甚日归兮把钓竿。空看枫叶丹。（朱中楣《长相思·思归》）<sup>⑬</sup>

望云山。过云山。身似羝羊进退难。青衫泪点斑。说辞官。又之官。林下何人把钓竿。负他双岫丹。（李元鼎《长相思·和思归》）<sup>⑭</sup>

“独有春光偏解事，却能委屈到官衙”之语，未必不是李元鼎仕清后的自辩，朱中楣则对以“何事春归归

① 《南乡子》小序，《众香词·礼集》，第4b页。

② 李元鼎《石园全集》卷一三《石园随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0页。

③ 《石园全集》卷一四《立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8页。

④ 《石园全集》卷一四《丁亥元日试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6页。

⑤ 《石园全集》卷一六《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成七绝》（其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108页。

⑥ 《石园全集》卷一七《春日感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111页。

⑦ 《石园全集》卷一五《浪淘沙·雨中感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97页。

⑧ 《拙政园诗余》卷下《满江红·示四妹》，《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二集），第3a页。

⑨ 《拙政园诗余》卷下《满江红·感事》，《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二集），第4a页。

⑩ 《石园全集》卷一五《满江红·丁酉仲夏，读陈素庵夫人词感和》（其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101页。

⑪ 《石园全集》卷一一《戟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72页。

⑫ 《石园全集》卷一一《和戟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72页。

⑬ 朱中楣《长相思·思归》，《石园全集》卷一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94页。

⑭ 《石园全集》卷一五《长相思·和思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94页。

未得，天涯犹自滞官衙”。她在《燕台竹枝词》中也抒发了类似的哀怨：“屡逢佳节动归思，却恋微官去较迟。”<sup>①</sup>《长相思·思归》中，朱中楣不愿夫婿“昔为官。又为官”，故以“家山”为托，李元鼎的和作却借“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易·大壮》）之典，强调身不由己，最终“说辞官。又之官”。

朱中楣“产自天潢，素怀宗国之纬”，且“淑德著于闺帏”<sup>②</sup>，可知其既信奉君臣忠义，也认同妇德恭顺。由此造成的两难困境，在陈鼎的《远山夫人传》中有所体现：

远山夫人朱中楣，江西南昌人，前朝宗室女也。……及笄，归吉水李元鼎，以恭顺称。……我朝定鼎，起用前朝诸臣，元鼎应诏出。中楣沮之不得，乃赠之以诗，曰：“妾身自是裙钗女，羞把蛾眉别画人。”不欲偕行，愿独处山中，辟纟课子。及元鼎拜少司马，诰封中楣夫人。然中楣甘荆布，不事浓华，惟朝夕吟咏自娱而已。<sup>③</sup>

朱中楣对李元鼎仕清“沮之不得，乃赠之以诗”虽难有确证，但她的现存作品中，却有对与李元鼎仕宦经历接近的熊文举出仕的调侃。顺治八年（1651），一度归乡的熊文举和李元鼎俱奉召出，朱中楣有“长安涛甚广陵涛，谁谓山人索价高”<sup>④</sup>“忆昔朱门旧日欢，为伤亲串总凋残。才连洛社堪娱老，只恐东山起谢安”<sup>⑤</sup>之语，未必不含微讽之意。陈鼎与朱中楣同时，《远山夫人传》中轶事应非无中生有，而朱中楣笔下随夫仕宦的隐痛也依稀可见。如《壬辰中秋前三日，长安寄怀熊姑母》中写道：“乱后余生未有涯，几从薄宦滞京华。清霜暗妒王孙草，玉树遥连帝女花。”<sup>⑥</sup>前两句表达了随宦京师的无奈，后两句“王孙草”“帝女花”之语，鉴于其宗室女身份，是否别有隐喻？她的《满庭芳》词提供了参证：“闲评。伤往事，王孙草绿，帝女花芬。渐苔侵蒋径，蒿满张门。剩有方池碧涨，凝眸处、树古亭新。”<sup>⑦</sup>虽未具言所伤之往事为何，但物是人非之情充溢笔端，“树古亭新”也令人联想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与“新亭对泣”之典。无论是对昔日“王孙草绿，帝女花芬”的追怀，还是对现今“清霜暗妒王孙草，玉树遥连帝女花”的哀愁，都是故国之思的体现。再如《孟春感怀》：

每闻羌笛动唏嘘，泪染重衫思故庐。苑柳含芽眉未展，山茶抱节叶难舒。春风野草愁兼长，夜月征鸿信亦疏。为忆当年苏武句，自怜何日整归车。<sup>⑧</sup>

表面虽为怀乡，但“眉未展”的苑柳与“抱节”的山茶，未必不是诗人襟怀难开、执着节操的写照。而滞留北地、持节不辱的苏武拒绝以“胡”变“汉”，用于此处也应不是信手为之。李元鼎评价朱中楣之作“或伤故国之黍离，或怀王孙之芳草，或叹时序之变迁，或感行旅之飘零”<sup>⑨</sup>，未必不能体会妻子隐衷，赴召北上途中所写的“偕隐诚堪老鹿门，江湖何事拜君恩”之中，也隐含着他的无奈。而朱中楣对夫婿纵有微词，也表述得十分委婉，“南归欲觅旧柴门，何意弹冠赴特恩”的哀怨后，又加以“知君自为苍生出，从古惟闻绮皓存”<sup>⑩</sup>的体谅和回护，将其比作“商山四皓”之一的绮里季，这正是她“以恭顺称”的妇德体现。

① 《石园全集》卷一三《燕台竹枝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5页。

② 熊文举《侣鸥阁近集》卷一《寿远山夫人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0册，第41页。

③ 陈鼎《留溪外传》卷一六《远山夫人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2册，第770页。

④ 原诗该句后自注：“时雪翁俱奉召入京。”（《石园全集》卷一四《辛卯长至日，得漪兰熊年嫂白门见怀诗四首，依韵答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9页）

⑤ 《石园全集》卷一七《代和熊少宰忆昔志感三首》（其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111页。

⑥ 《石园全集》卷一四《壬辰中秋前三日，长安寄怀熊姑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91页。

⑦ 朱中楣《满庭芳》，《石园全集》卷一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121页。

⑧ 《石园全集》卷一四《孟春感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5页。

⑨ 《石园全集》卷一三《石园随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0—81页。

⑩ 《石园全集》卷一二《和〈辛卯季夏，赴召北上，舟次清源，内子持扇索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75—76页。

宦海云谲波诡，李元鼎“顺治初两为兵部侍郎，两定死罪”<sup>①</sup>，他曾这样叙写患难与共的夫妻深情：“沧桑更易，河山旷邈，余既遭时弗逮，又赋命不犹，从刀锋剑血中，万死一生，不知凡几，皆内子周旋而左右之。”<sup>②</sup>朱中楣终身践行贤妇之道，虽曾对熊文举出仕微露讽意，但赠予熊妻杜漪兰之诗又写道：“天涯犹忆共艰辛，雪后寒梅欲放春。寄语燕台堪对酒，山公还是画眉人。”<sup>③</sup>乱世太多艰辛与无奈，“山公还是画眉人”是劝慰杜漪兰，亦是自宽。这正是身为武臣之妻的女遗民特有的情感体验。

潘翟真实呈现了身为忠臣之妻的苦痛；而朱中楣等人笔下，却流露出与武臣之夫濡沫相守的复杂情绪。二者看似抵牾，实际上都反映了女遗民在精神层面不盲从于男性的独立性。她们虽无力左右夫婿抉择，但借诗歌彰显被男性书写忽略的儿女情长，或对夫婿改节予以讽谏。正是这种“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引领着女遗民不断思考求索，在作品中表现出与男遗民不同的性别体认。

### 三 遗民境遇中的性别怅恨

明清时期，随着女性文学素养的普遍提升与女作家的大量涌现，“女性性别主动力（the gendered agency）开始首次显著地在中国历史上被女性自身书写”<sup>④</sup>，鼎革之际的女遗民或坦然书写“君臣之义”背后的“儿女之情”，或含蓄表露武臣之妻的心理困境，这种带有性别特征自我叙述，使女子乱世的颠沛际遇与曲折心事得到真实呈现。但即便表达家国之思，女遗民往往更倾向于从细节而非宏大场景入手，并融进操持米盐琐碎的实际生活体验。这在女诗人张鸿逖笔下正有所体现。

张鸿逖字琴友，浙江慈溪人，姚筹妻。其父成义，字能信，刘宗周弟子，顺治初曾参与浙东抗清斗争<sup>⑤</sup>。受家庭熏陶，鸿逖“心少陵之心，诗少陵之诗，于忠孝节义而发为刚毅激楚之音”<sup>⑥</sup>，笔端多有对民生的关怀与对故国的追忆：“遥怜万里关山月，断草零烟哭杜鹃。”（《清音集·登楼有感》）<sup>⑦</sup>“柳丝袅袅弹春风，燕子呢喃问故宫。火禁国中怜妇孺，烽传塞外困英雄。”（《清音集·寒食前感时而作》）<sup>⑧</sup>其《秋日索画换米不得》诗云：

北斗南箕迥自应，墨痕无分换炊烟。空将蝉鬓餐风露，故把蛟绡当石田。纸上山河迷赤县，中原禾黍怨苍天。河清固有千年问，问我生逢第几年。（《清音集》）<sup>⑨</sup>

前两联描述断炊窘况，“蝉鬓”点明女子身份；后两联推己及人，抒发了对河山更易的悲慨和对苍生涂炭的悲悯。作为操持中馈的女子，诗人将黍离之悲融贯于料理衣食的现实艰辛，其父抗清失败后亡命天涯，怀父诗中“寂历柴门长昼掩，青黄齑瓮伴早餐。穷愁况是女流辈，千里云深泪未干”（《清音

①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七“李元鼎”条，《清代传记丛刊》，第20册，第883页。

② 《石园全集》卷一三《石园随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0页。

③ 《石园全集》卷一四《辛卯长至日，得漪兰熊年嫂白门见怀诗四首，依韵答之》（其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89页。

④ 方秀洁《明清女性创作绝命诗的文化意义》，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⑤ 《小腆纪传》卷五八“刘应期”条载：“同邑张成义，字能信，亦宗周弟子也。丙戌（1646）后，起兵不克，行遁去，不知所终。”（第658页）又查继佐《鲁春秋》“凌之标”条载：“鲁败，鼓其同学张能信与北降练总罗奎北反。奎辄悔之，反发其事。能信脱，执之标索之；之标卒不吐。”（《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06册，第50页）

⑥ 冯元仲《清音集序》，张鸿逖《清音集》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初抄本。

⑦ 该诗题后注有“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

⑧ 该集作品按年代顺序编排，该诗紧随《戊子人日初度》，当作于顺治五年（1648）或稍后。

⑨ 该诗编排于辛卯之后、壬辰之前，应作于顺治八年至九年（1651—1652）。

集·雪中怀父》)①的叙写,正展现了女遗民的真实生活体验。

脱离闺帏,卷入乱世的风起云涌,女遗民对性别制约体会更深。王端淑的《苦难行》有详尽书写:“甲申以前民庶丰,忆吾犹在花锦丛。莺啭帘栊日影横,慵妆倦起香帏中。一自西陵渡兵马,书史飘零千金舍。髻鬓蓬松青素裳,误逐宗兄走村野。……宿在沙滩水汲身,轻纱衣袂层层湿。……病质何堪受此情,鞋跟踏绽肌肤裂。……抱赧羞颜何所倚,墙延蔓草扉半开。吾姊出家老父死,骨肉自此情意疏。”② 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占杭州等地,端淑历尽艰辛回到故乡绍兴,其父已殉明而死,国破又兼家亡。生长于“花锦丛”的女子体质柔弱,且自幼缠足,逃难不但遭受“鞋跟踏绽肌肤裂”之苦,更面临贞操被侵犯的危险。端淑《次宫妃宋蕙湘四韵二十八首》中“裁云不解长门怨,今识胡歌塞上来”③“健儿马上凌红粉,笑谓同群得美姝”④之语,正是借被元军劫掠的南宋宫人,表现女子于战乱中落入清兵之手的悲惨命运。

囿于性别,女性于乱世“独善其身”不易,“兼济天下”更难。在《悲愤行》中,端淑对清政权抱以“凌残汉室灭衣冠,社稷丘墟民力殫”之痛恨,对女性遭侵袭抱以“娇红逐马闻者酸,干戈扰攘行路难”之同情,对男子改节抱以“何事男儿无肺肝,利名切切在鱼竿”之鄙夷,篇末抒发了“天风借吹膺血干,征贤深谷出幽兰”⑤的报国救世之志,最终却“空掩楚囚悲,恨乏木兰力”⑥,隐居终老。与之相似,女遗民朱中楣也表露过“愧我无从挥尺剑,扫除梲杙振君威”⑦的怅恨。而在“毁尽钗环纾国难”的女英雄刘淑身上,性别的限制体现得更加明显:

刘淑英(按,刘淑又作“刘淑英”),江西庐陵人,故忠烈刘公铎女也。……母萧恭人陈忠烈遗书教之,旁及禅学、剑术、孙吴兵法,莫不精晓。……顺治三年丙戌,楚将张先壁驻永新,闻淑英名,请谒。淑英欲资为助,则大喜,开壁门见之。流涕为言,指陈大义,诸军闻之,无不变色却立者。……然先壁心持两端,卒不敢赴敌,且欲纳淑英为配。淑英大怒,即筵间拔剑,将斩先壁。先壁环柱走,一军皆惊,尽甲。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诗曰:“销磨铁胆甘吞剑,扶却双瞳欲挂门。”大书于壁,从容北向拜曰:“妾将从先国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壁悔且惧,率麾下叩头请死。淑英曰:“妇言不出于阃,吾为国难以至于此。事之不济,天也。将军好为之。”跨马去,尽散其所募士,使归田里。辟一小庵,曰“莲舫”,迎其母归养,诵佛以终身焉。⑧

刘淑囿于“妇言不出于阃”的传统女德规范,即便“流涕为言,指陈大义”,却也不得不将杀敌复国之望寄托于男子(前文所举《送某公从军》一诗也体现了同种倾向)。对男性将领失望之余,生出“事之不济,天也”的幻灭情绪。她虽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笔下不乏“床头饶一剑,三跃起吞胡”⑨“如今欲试屠龙手,先斩楼兰定贺兰”⑩“只今犹忆先人笔,愿扫骄胡洗甲还”⑪的豪言壮语,

① 该诗编排于庚寅之后、辛卯之前,应作于顺治七年至八年(1650—1651)。

② 《吟红集》卷三《苦难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第8页。

③ 《吟红集》卷一三《次宫妃宋蕙湘四韵二十八首》(其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第63页。

④ 《吟红集》卷一三《次宫妃宋蕙湘四韵二十八首》(其二十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第65页。

⑤ 《吟红集》卷三《悲愤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第8页。

⑥ 《吟红集》卷四《秋夜吟》,《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第15页。

⑦ 朱中楣《读史》,《石园全集》卷一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106页。

⑧ 汪有典《前明忠义别传》卷三一《两女将军传》,《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辑第19册,第315页。

⑨ 《个山遗集》卷一《丙戌岁余志感》,第17a页。

⑩ 《个山遗集》卷三《有感二首》(其二),第3b页。

⑪ 《个山遗集》卷四《自叹十五首》(其十五),第8a页。

终究只能悲叹“非关剑不利，自惭匪男儿”<sup>①</sup>“莫笑钗环锋不利，时危劫尽数应乖”<sup>②</sup>，尽散所募士、归乡养母奉佛，当是无计可施后的无可奈何之举。在深切意识到性别限制造成的不公后，某些女遗民转而痛恨自己的女儿身，顾贞立便是一例。

顾贞立为顾贞观之姊，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她多有孤傲激愤之作，且时露不甘雌伏于男子的巾帼意气：

仆本恨人，那禁得、悲哉秋气。恰又是、将归送别，登山临水。一派角声烟霭外，数行雁字波光里。试凭高、觅取旧妆楼，谁同倚。乡梦远，书迢递。人半载，辞家矣。叹吴头楚尾，儵然孤寄。江上空怜商女曲，闺中漫洒神州泪。算缟素、何必让男儿，天应忌。<sup>③</sup>

该词为官署闻警而作，在男作家笔下，女子往往对军国大事表现得麻木不仁，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而顾贞立不但展现了忧心国事的襟怀，更发出“算缟素、何必让男儿，天应忌”的呐喊。因痛感身为女性无从施展抱负，顾贞立常在作品中对女性化装扮加以否定：“掠鬓梳鬟，弓鞋窄袖，不惯从来。”<sup>④</sup>“堕马啼妆，学不就、闺中模样。”<sup>⑤</sup>《女性词史》评价顾词“摆脱了惯常的‘女性化’情调而具备了‘泛人格化’色彩”<sup>⑥</sup>，但这种因意识到性别限制而对女性化柔弱情调的刻意回避，又恰恰是女性特征从另一角度的呈现。在抒写遗民心绪的《虞美人》中，顾贞立写道：

暗伤亡国偷弹泪。此夜如何睡。月明何处断人肠。最是依然歌舞、宴昭阳。几年尝遍愁滋味。难觅无愁地。欲笺心事寄嫦娥。为问肯容同住、广寒么。<sup>⑦</sup>

顾贞立之夫侯晋不过一介刀笔小吏，在她“多病不堪操井臼，无才敢去嫌天壤”<sup>⑧</sup>的自我开释中，正隐含着“天壤王郎”的怅恨。古代女子既无建功立业之出路，亦难有纵情声色之排遣，家庭几乎是唯一寄托。前文提及的明遗民李因，夫亡后“抱故国黍离之感，凄楚蕴结”，“亡国之音与鼓吹之曲共留天壤”，她对自身处境和心态作过如下刻写：

莺声渐老春归去。游丝着意留花住。独自倚空楼。珠帘懒上钩。妒他双宿燕。故把重门键。月照小栏杆。罗衣怯暮寒。<sup>⑨</sup>

邓红梅先生分析该词“清楚地显示出当国亡、夫亡之后，她那愁心郁悒的‘故国黍离’之悲与‘空闺断轸’之感”（《女性词史》，第238页）。在女遗民笔下，亡国之痛时常与所托非偶之憾、早丧所天之悲交织在一起。顾贞立将心事诉诸广寒宫里的嫦娥，与之相类，刘淑也把嫦娥比作薄命佳人，声言“安得破镜飞上天，为卿一补凄凉缺”<sup>⑩</sup>。将同为女子又同处孤清之地的嫦娥引为同调，是一种性别特征的表露，也展现了女遗民在“国”与“家”两处都无所凭依时的双重寂寥。

## 结 语

中国古代的女性虽与政治较少关涉，但朝代更替之际，女子的身家性命、祸福荣辱难免受政治环

① 《个山遗集》卷一《感怀二首》（其一），第21a页。

② 《个山遗集》卷二《感遇七首》（其四），第5b页。

③ 顾贞立《栖霞阁词》卷上《满江红·楚黄署中闻警》，《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集），第7a—7b页。

④ 《栖霞阁词》卷上《沁园春》（掠鬓梳鬟），《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集），第8a页。

⑤ 《栖霞阁词》卷下《满江红》（堕马啼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集），第14a页。

⑥ 邓红梅《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⑦ 《栖霞阁词》卷上《虞美人》，《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集），第10b页。

⑧ 《栖霞阁词》卷下《满江红》（堕马啼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集），第14a页。

⑨ 李因《菩萨蛮·春归》，《竹笑轩吟草》（三集），清康熙刻本，第53b页。

⑩ 《个山遗集》卷五《薄命妾》，第3a页。

境及周围男性的影响，女遗民笔下的身世之感中，同样蕴含家国之思。她们悲身世、哀故国，与男遗民有相通之处，体现了知识阶层跨越性别差异的心理共感和家国情怀，也反映了男性主流价值观向闺阁的渗透。然而，同样表达家国之思，女遗民又表现出与男遗民不同的性别特征，或倾诉身为烈臣之妻的艰辛，或坦言对安宁生活的向往，或含蓄表露对夫婿改节的不满，或痛恨身为女子在乱世难有作为。这些作品不但提供了探究当时知识阶层女性生活与心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在男性书写之外，为我们打开了窥探鼎革之际历史的又一扇窗口。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相似的文本因作者性别不同，会让后世读者产生不同的期待视野，比如明清之际的男性作品往往被用来推求深层家国隐喻，而女性之作则时常被归为单纯的光景流连或身世感慨。实际上，在明清鼎革的特殊历史情境下，隐喻寄托成为时人惯常的写作手法，甚至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如以“朱”“日月”指代“明”。女遗民作家既多为“名父之女”“才子之妻”，则其创作受男性影响而出以隐语，也在情理之中<sup>①</sup>。本文所述女遗民的家国书写，不乏通过这一手法来加以表现的例证。但是，由于女作家生平背景较之男性沉埋不彰，因此，如何准确定位女遗民创作中“家国”与“性别”的结合点，是日后相关研究深入展开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需要在文献钩稽与文本阐释两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作者简介] 乔玉钰，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发表过论文《论江户时代女性汉诗对中国文学的因革——以江马细香、梁川红兰为例》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sup>①</sup> 如祁彪佳之女祁德茵《鸡冠花》诗云：“肯把秋容让菊花，满树绛幘斗繁华。窗前谈罢潇潇雨，坊外呼来片片霞。禁苑晓筹无复报，后庭玉树亦堪嗟。且教点染东篱脚，不隶朱家与祝家。”（《祁彪佳集》，第291页）“禁苑晓筹”与“后庭玉树”用杨玉环、张丽华之典，指向较为明显，而“朱家”“祝家”之语，表面一指朱氏翁，一指祝鸡公，但联系祁氏一门鼎革之际惨痛的家族经历（德茵父彪佳殉国，兄长理孙、班孙一死一徙），“朱家”喻“明”，“祝家”喻祝发之“清”，“不隶朱家与祝家”谓对脱离政治漩涡之隐逸生活的向往，也言之成理。